

宋|代|研|究|丛|书



邓乔彬 著

# 宋代绘画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

宋代研究丛书

# 宋代绘画研究

邓乔彬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绘画研究/邓乔彬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1091-357-3

I. 宋… II. 邓 III. 绘画史-中国-宋代  
IV. J209. 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5740 号

责任编辑 程民生

刘小敏

责任校对 史卫

---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行管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 hupress. com E-mail: bangong@hupress. com

经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印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18. 875

字数 490 千字

插页 4

---

ISBN 7-81091-357-3/K·395

定价:42. 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 作者简介

邓乔彬，广东珠海人，1943年生于重庆。196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甘肃从事中学教学多年。1981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留系任教21年。现为暨南大学特聘教授，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先后出版学术专著《吴梅研究》、《有声画与无声诗》、《唐宋词美学》、《中国词学批评史》（合著）、《学者闻一多》（合著）、《中国绘画思想史》（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论文集《词学廿论》；另有《爱国词人辛弃疾》、《宋词与人生》、《文三百篇》（合编）、《豪放词萃》（主编）、《绝妙好词译注》（主编）等书；曾参加《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副主编）、《中国词学大词典》（编委）等书的编纂，另主编、参编高校教材及自学考试教材、教参、工具书约30种；发表研究古典文学、绘画及古代文艺理论学术论文130多篇，在各种书刊、鉴赏辞典上发表学术短论及古代作品赏析170余篇。论著计近500万字，编著200余万字。1996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2004年被评为南粤优秀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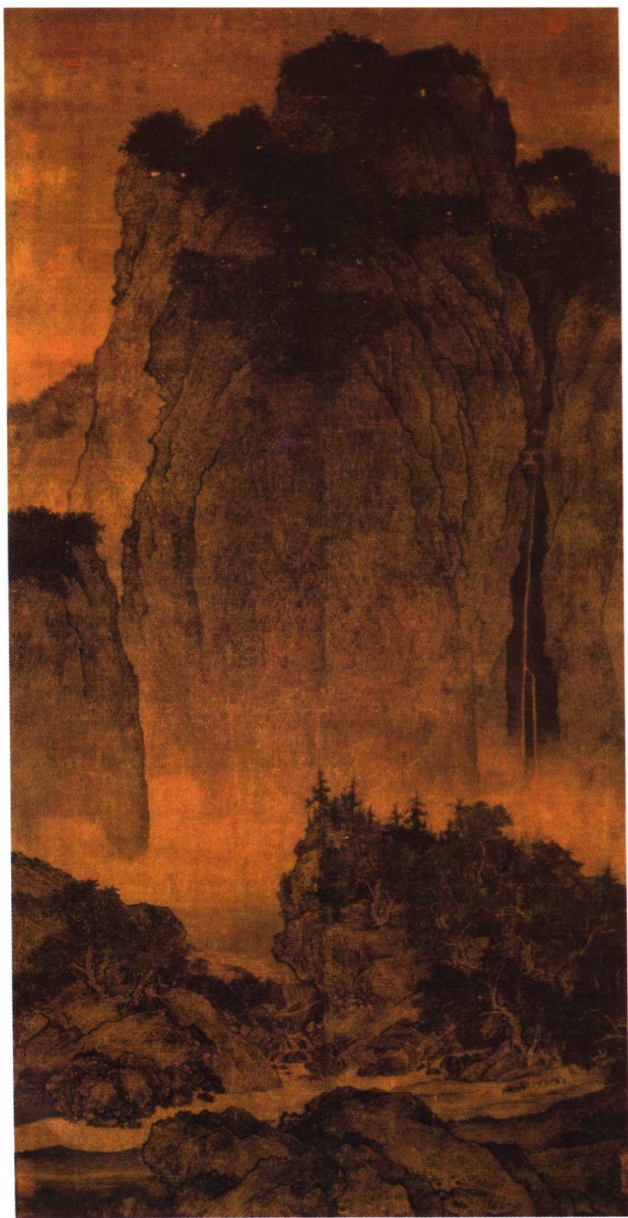


图1 范 宽 溪山行旅图



图2 李公麟 临韦偃放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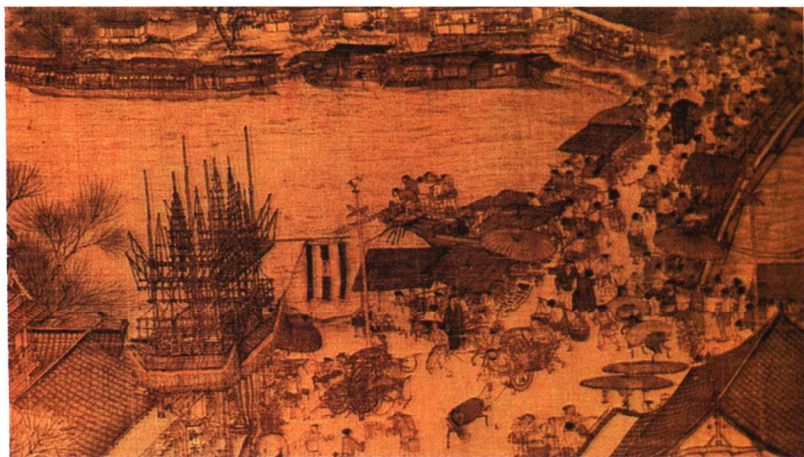


图3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图4 [传] 赵 佶 听琴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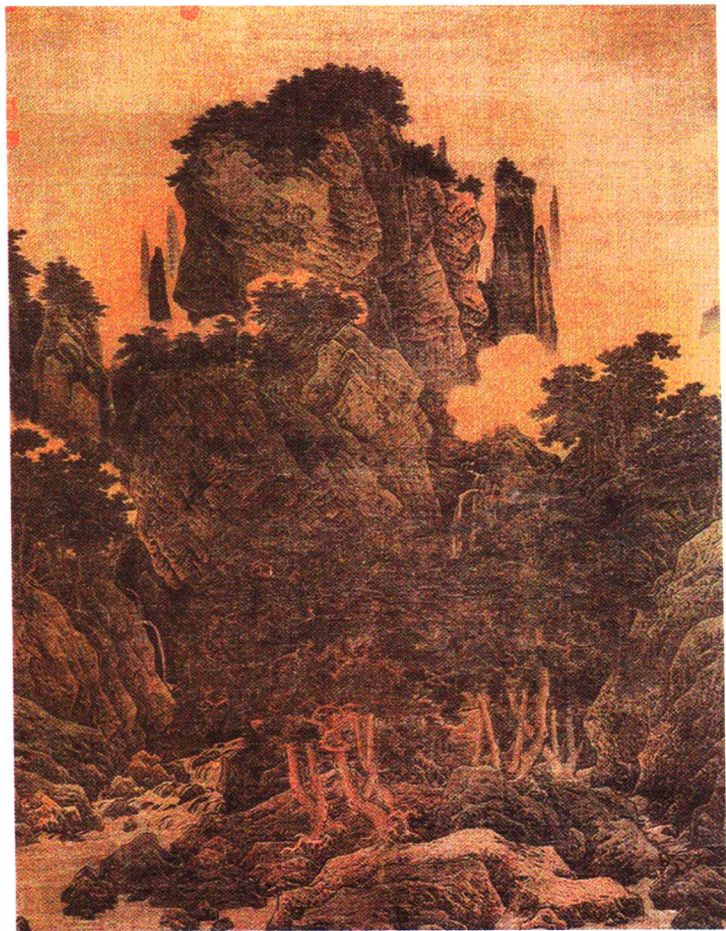


图5 李唐 万壑松风图





图6 李迪 鹰窥雉图



图7 马远 踏歌图



图8 佚名 却坐图





图9 [辽] 佚 名 丹枫呦鹿图



## 绪 论

宋代在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朝代。我国出于尊古敬古的传统,往往对古代作理想化的描述和推崇,政治家、史学家多言三代之治,无论是政治的变革抑或文艺的创新,多举起复古的旗帜。或许是因为近代以来屡屡在外来侵略面前失败、受挫,引起了对历史的反思,思想家们在睁开了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多少受到西方进化论史观的影响,“向后看”的积习开始有所改变,在观照古代史时,开始注意到历史演变中的关纽所在,而不是一味地崇古,随之也对宋朝在我国历史演变中的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严复在《致熊纯如函》中指出:“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sup>①</sup>日本汉学家内藤虎次郎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将中国古代社会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先秦至东汉为古代,魏晋至唐中期为中世,宋代以后为近世(其中宋、元为近世前期,明、清为近世后期)。而宋代之所以能被判断为近世,是因为到宋代才出现贵族政治的崩溃,君主独裁政治得以确立,平民文化昌盛,庶

<sup>①</sup> 《严复集》第三册,第66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民地位得到提高。<sup>①</sup>胡适在其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也从中国哲学思想的演变提出了类似的“三世说”,其中的宋元明清为近世。

作出以宋代为近世的判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诚如内藤虎次郎所说,宋代是君主独裁政治得以成立的朝代。宋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的军阀割据教训,设计并推行了一整套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将军权、政权、财权和司法权都收归朝廷。北宋前期虽保留了前朝的三省六部,却削弱其主事权,使之成为闲散的机构。为削弱相权,以中书门下取代三省,宰相被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另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成立枢密院以主军事,与中书门下分管文、武大权。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是三司,长官三司使号称计相。尽管后来的皇帝对官制曾有过改革,但总体精神不变,即皇帝集权进一步加强,而臣僚的权力则被分散。

君主独裁政治虽与一般意义上的近代有异,后者常将封建制度的解体看作近代的标志,但是沿着内藤虎次郎将贵族政治的崩溃与君主独裁政治相对举的思路,我们自然可以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实行君主独裁的同时,随着贵族政治的崩溃,平民文化的昌盛和庶民地位的提高,宋代也就具有了前代所不具备的某些民主色彩。

从选官制度而言,宋朝可谓我国科举制度发展的黄金时代。如果说唐朝的科举已废魏晋六朝所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改变了长期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状况,但还是遭到不少权相的反对,且唐朝科举所录取的人数还是相当的少。宋代则不然,深知势家使孤寒路塞的宋太祖,为尽革畴昔之弊而躬亲临试,创立殿试制度,以决士子进退。这即将唐代的恩归考官改变为恩归皇帝,在加强皇权同时,又笼络了士子之心。对各科举人,只重考试而不

<sup>①</sup> 此文收入《内藤湖南文集》,筑摩书房1969年版。

重门第,使科举制真正向最广大的阶层开放,而平均每次的录取人数相当于唐朝的十倍以上。为保证公平竞争,不仅令有关的官员与亲属、门客回避,为防止考官辨认笔迹,又实行糊名制。无疑,这是彻底清除贵族垄断政治的重要举措,似可以与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士人摆脱对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相比拟。西方有些史学家对我国古代文官制度颇有肯定,其实与宋代大有关系,因为只有宋代,才在科举上超越了唐代,且为后来的明、清两朝所不及。

就士人的待遇而言,元代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又有“九儒十丐”之说,长期不开科举,自不必论。明代的开国之君对自己的出身缺乏自信,而对士人怀着一种嫉恨和警惕的感情,其文化专制主义推行甚酷,朱元璋既搞文字狱,又亲自删去孟子著作中表现出民本思想的内容,以八股取士,思想禁锢与文化高压并行,这种状况持续甚久。清代因系少数民族掌握政权,对汉人采取过一个时期的严酷手段,后来施行恩威兼施政策,在拉拢士人同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仍大兴文字狱。所以,与前后诸朝相比,也只有宋代的最高统治者能如此宣称:“(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sup>①</sup>虽然士大夫所“治”只能是一种参与,并不能改变“朕即国家”的根本事实,却也多少体现出在封建政体内的民主倾向。

“与士大夫治天下”,使得士大夫们具有了与此前所不同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的人生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不只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通过科举博得功名富贵,而是对政治有积极的参与热情,对朝政可以不避直言,而不是只萦念于个人的荣辱升沉,气节和人格尤其被士林推重。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在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同时,既说出了宋代士人忧国忧民的深重忧患意识,也体现出不只“对上”、更见“对下”的深厚的民本思想。而他这种襟抱、情怀对于

<sup>①</sup>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

振作士气、大厉名节起了很强的导引作用，后来朱熹对范氏给予士林的榜样意义屡为称道、赞叹。与范仲淹共同参与庆历新政的欧阳修，不仅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人物和著名的学者，也是对砥砺士大夫名节起了典范作用的重要人物。论者们以为，“真、仁之世”的士大夫所树立起来的政治气节、入世精神，对宋代历史的影响至为深远。

以上所说的这些具有近代色彩的政治同绘画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妨结合郑午昌先生《中国画学全史》而论之，因为此书也恰被一些论家认为是第一部具有近代意识的绘画史著作。

《中国画学全史》将我国古代绘画分为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四个发展阶段，这是很有宏观识力的，如果说前三个时期还是绘画的古代期，那么文学化则是绘画进入近代的标志。

郑氏所说的实用时期指传说的古史时期，茫昧难详，难以求之于实证，我们且看后三个时期。礼教时期的汉代，点缀政教、纪功颂德的绘画，无论是画工所作，还是画家所画，都是为宫廷服务的。而宗教化时期的绘画，著名的画家如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在帝王修建的佛寺绘画，自是为帝王服务，而曹不兴的奉命为孙权作画，陆探微的常侍宋明帝左右，且为宫廷贵族写照，张僧繇的为梁武帝的直秘阁知画事，奉命为之作佛画，装饰佛寺，则更是直接为宫廷服务。唐代的著名画家，如阎立本、尉迟乙僧、张萱、吴道子、周昉等，无不是为宫廷服务的画家。

宋代绘画一方面延续并发展着绘画的礼教化和宗教化。

帝王和最高统治集团所确立和提倡的治国思想，使得绘画题材具有难以移异的历史规定性。宋代帝王重儒学，对礼教性绘画有必然的促进作用。如宋仁宗是一个“务本向道”的皇帝，虽喜好柳永词，却鄙薄其为人和操行，认为他只能在风前月下浅斟低唱，不可令仕宦，故在临轩放榜时特黜落之。因而，他对绘画的鉴戒作



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庆历元年曾下令命画院高手描绘前代帝王的“美恶之迹”，以作为鉴戒，且自为之记，名之为《观文鉴古图》，画成后，命张于殿壁，让群臣观看。宋代后来曾有多次的图绘功臣像之举，其规模远较汉、唐时为大，这既说明宋代对功臣像作为礼教性绘画所起“兴废之诫”作用的重视，也说明只有似宋代这样具有规模空前的画院，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礼教性绘画创作。

儒学是用于治世，而宗教则有“益仁智之善性”的作用，宋代即使连著名的理学都是吸收了佛、道两家思想的新儒学，更不必说在道教和佛教流行了这么久之后，最高统治者会将它们弃之不顾了。宋太祖从开国以来，就重视佛教，其中政治原因居多，因为他看到了周世宗限佛影响了社会的安定，故汲取教训，下令停止毁佛，重开佛教。宋太宗不仅建立了国家的译经院，亲自过问译经事，而且因提倡佛教而使僧尼数大为发展，真宗时更甚。但是，到宋仁宗时期，由于更重视儒学对治理国家的作用，僧尼数逐渐减少，神宗时进一步下降。宋徽宗因重视道教，佛教受到很大打击。南宋初，佛教徒一改过去“不与世事”的态度，参与了抗金斗争，佛教得以平稳发展。相比之下，宋代似更重视道教，太祖、太宗都与道士有很好的关系，真宗更演出过神人降天书的闹剧，大修道观，优待道士。宋徽宗时期，可以说崇道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南宋无论是高宗、孝宗、光宗、理宗，都热衷于道教。对佛道的重视，必然促使宗教性绘画在唐人的基础上仍有所继续以至前进，还出现了如武宗元这样与吴道子几可齐名的宗教画家。

宋代绘画另一方面又开始了文学化的近代进程。

诚然，宋代的绘画还持续着前代的性质和功能，但文人画的兴起，则标志着绘画从服务于宫廷、政教，到用于自抒其情、自娱自乐。郑午昌先生将绘画的文学化时期定在开启于宋代，是因为看到了宋代文人画的兴起给绘画史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绘画的文学化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建立具有直接的关